

蒙元时期的白城

元朝时期白城设置

●宋德辉

元朝时期，是指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到至正二十八年八月(1368年8月)，明军攻克元大都，元王朝瓦解止。在此之前，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到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这一时期，一般称为蒙古汗国时期。

蒙古国的东道诸王

蒙古汗国建立以后，成吉思汗将蒙古国东部地区分封给四个弟弟和五个投下，史称东道蒙古诸王。在东部诸王中有成吉思汗的四个弟弟和五个战功卓著的功臣。其四个弟弟分别为：二弟哈萨尔，封地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呼伦湖一带和跨有额尔古纳河流域，东侧包括海拉尔河各支流地区，与占有大兴安岭地区的斡赤斤封地毗邻。三弟哈赤温早卒，其子按亦台承袭王位，封地在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北部，即在内蒙古高原正东部，大兴安岭西南端以西，北起克鲁伦河中下游至哈拉哈河下游，南至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乌拉盖尔河流域。四弟斡赤斤在四兄弟中受封最早，所得土地与民户最多，其权势位居东道诸王之首。初次封地在哈拉哈河至大兴安岭地区。以后在斡赤斤家族极盛时期其自行扩占地区南界达黑龙江省汤旺河流域，北已延伸至外兴安岭和整个松花江以北地区，包括嫩江流域和今天的白城、松原地区。另有别勒古台，为同父异母弟，其封地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方，巴颜乌拉山南麓。大体在克鲁伦河中游以下游以北，至斡难河上游之间，东与哈萨尔家族封地相连。

在东部诸王中，札剌亦儿、弘吉剌、亦乞烈思、忙兀、兀鲁五部归附成吉思汗较早，“当开创之先，协赞大业”，声名显赫，功绩卓著，成吉思汗因“命其子孙各因其名为氏，号五投下”。“五投下因战功得与成吉思汗子弟同时受封，封地多在辽阳行省西南部。

成吉思汗的四个弟弟和五投下统称为东道诸王，蒙元时期，蒙古诸王始终享有较大的自治权，诸王可以自行设置官属，任免官吏；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拥有大量的军队，是国家依靠的重要军事力量。蒙古汗国时期，以东部诸王监镇东北地区，这是成吉思汗分封东道诸王时的本意，就是要他们成为蒙古汗国的屏障，加强对边陲地区的控制，但是随着东道诸王势力的不断增长扩大，其中一部分人逐渐滋长了与中央之间的离心倾向。他们不仅藐视地方官员，甚至连皇帝的使臣也不放在眼里。

辽阳行省与白城建置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深感东道诸王这种离心倾向对蒙古汗国统一的威胁，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于1264年8月设置辽阳行省，当时称北京行中书省，初设后仅存一年，于至元二年(1265年)闰5月撤销。这次撤销的主要原因是元朝在全国开展“省并州县二十余所”的政权设置调整的影响下进行的。至元六年(1269年)，又在东北地区设立东京等路行中书省。

至元十年(1270年)3月，改东京等路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行尚书省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东北诸王的权力，但也不可避免的遭到东北诸王的反对。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4月，改北京行省为宣慰司，撤销了北京行省。第二次设立的北京行省存在了8年，反映了中央皇权向地方蒙古诸王势力的妥协。

至元十六年(1279年)4月，南宋余部最后被消灭，元朝政府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从而推进了地方政权建设。与此同时，西北蒙古诸王屡叛，对元朝政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忽必烈充分认识到，为巩固其统治，一方面要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蒙古诸王的控制。不仅西北诸王屡叛，东北也是一个诸王密集，政治上十分不安定的地区。其中特别是东道诸王之首帖木格斡赤斤一系，“父子祖孙兄弟雄踞辽东，早有轻朝廷之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北京宣慰使亦力撒合奏报：“诸王乃颜镇辽东”“察其有异志，必反，密请备之”。忽必烈于是以再建行省作为重要预防措施之一。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2月，为控制东道诸王，第三次设立东京行省。东京行省设立后，东道诸王反映强烈，“多不自安”，暗中加速了叛乱准备。在西北诸王叛乱未平息，东道诸王又蠢蠢欲动的严峻形势下，元朝政府为了扭转东西两翼同时遭到威胁的被动局面，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7月，从成立到撤销不到半年后，又第三次宣布撤销。

辽阳行省第三次撤销，元朝中央政府向东道诸王的再次妥协，并未能平息和阻止蓄谋已久的叛乱。终于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4月，爆发了乃颜之乱。

乃颜是东道诸王之首帖木格斡赤斤的五世孙，著名的塔察儿国王的孙子。参与叛乱的还有哈萨尔后王势都儿，合赤温后王胜纳哈儿、哈丹鲁鲁干(鲁鲁干是蒙语，“头人”的意思)等。由于元政府早有准备，加上忽必烈率军亲征，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6月，于撒尔都鲁(今贝尔湖东南)，不里古都伯塔哈(今哈拉哈河与诺木尔金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失列门林(西拉木伦河)之地。元军“三战三捷”，平定了这场元朝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武装叛乱，并诛叛首乃颜。这次叛乱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几乎波及东北全境，双方投入兵力近20万，史料记载，仅发生在今天白城周边归流河、洮儿河、嫩江一带的战斗就有大小数十战。

乃颜叛乱之后，东道参与叛乱的诸王兀鲁思(领地)皆被废除，所统军民被析分。但是，根据“黄金家族”“有福同享”的原则，包括忽必烈在内的任何元朝皇帝都不能彻底剥夺蒙古诸王兀鲁思的世袭统治。不久成宗继位后，其嫡系宗王逐渐恢复了掌管本家族和封地内军民的权利。武宗即位后，推恩宗室，三家诸王斡赤斤、哈萨尔、合赤温先后皆被授一字王封号，但地位已降为完全从属于朝廷的列王，已不再具有昔日藩国之君的显赫权威了。

在平息了乃颜叛乱之后，元政府已基本控制了东北地区形势，忽必烈从长治久安出发，采取了果断措施，于至元二十四

(1287年)十月，在东北地区第四次设置了行省机构——辽阳等处行尚书省。

行省是元朝的地方机构，是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凡地方军、政、钱、粮无所不统领。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各自又按户口多少分为上、中、下等。路统于行省，设总管、同知等官员。府一级普遍设，统属也不一样，或统于路，或统于行省，或直属于中书省。府设府尹或知府等官员。州设州尹、知州。县设县尹等。

元朝时期东北隶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管辖。辽阳行省共设“路七、府一、属州十二、属县十”。早在蒙古国太宗十三年(1241年)和元朝初期已将位于今天洮北区的城四家子古城作为泰州和泰宁路治所记录在册。《元史·吾也而传》记载“(窝阔台)十三年(1241年)，遣其子孛从吾也而来朝。帝大悦，厚加赐予，俾充北京东京广宁盖州平州泰州开元府七路征行兵马都元帅，佩虎符”。这里的泰州路，即为蒙元时期设在城四家子古城的泰州。只是因为当时属于东道诸王之首斡赤斤家族封地，而没有设置政权机构。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二月，“改辽阳行省泰州为泰宁府”。延祐四年(1317年)二月“升泰宁府为泰宁路，仍置泰宁县”，四月仍“以太宁路隶辽阳省”，太宁即泰宁。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十二月，“以泰宁县五千户封买奴为泰宁王”。其治所在今城四家子古城。

元朝时期除在白城设有政权机构外，还设有“驿站”，蒙古语称“站赤”。驿站制度是蒙元政府的神经与血液网络，对维护统治具有重大的作用。窝阔台即位，下令在全境遍建驿站。统领全国驿站最初为诸站都统领使，后属兵部，至元十三年(1277年)改组为独立的通政院。据《元史》所载辽阳行省有陆站105处。辽阳行省的驿道可划分为二十三条。途径白城的驿道是：西祥州(今农安县东北)至吉答(黑龙江省龙江县附近)线。此驿道各站的规模较大，仅次于西、南各线。另一特点是车辆多，可能与松辽平原地势平坦利于车辆行驶有关。途径白城的驿道所设站亦有：二龙山古城、新荒古城、金善屯古城、古城屯古城、城四家子古城(泰州站)、后少力古城(吾拉毛州站)、大乌兰吐古城、十家子古城、蒙古屯古城、土城子古城等。其中最大的是泰州城站，有交通工具：马42、牛42、狗42。至元七年(1270年)，在泰州城站设头目二名，统一管理。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设站官两员、设百户一名。至元四十八年(1311年)又在站赤设提供一员，司吏一名。

在站赤设有“堂、室、庖”，供乘传者食宿。使臣宿于站中，由站户每日定量供给米、面、酒、肉以及油盐、柴炭等物，路过而不宿于站赤者减半供给。

在镇赉县沿江镇雁鸭岗子发现的皇庆元年(1312年)中书礼部造的铜印“吾刺毛州站印”，便是西祥州至吉答线途径镇赉县境内后少力古城的一个站赤之印。后少力古城即吾拉毛州站所在地。从吾拉毛州沿嫩江此行经大乌兰吐古城，十家子古城一直到吉答。(二十二)



后少力古城出土的龙纹瓦当。



后少力古城出土的元代驿站印。



城四家子古城出土的元代绿釉狮子灯。

成语故事

举案齐眉



形容夫妻之间恩爱互敬。

《后汉书·梁鸿传》：“（梁鸿）遂至吴……每归，妻（孟光）为具食……举案齐眉。”

东汉年间，高士梁鸿与妻子孟光辗转至吴地(现苏州、无锡一带)隐居，生活虽然清

苦，但他们还帮助当地百姓兴修水利、疏浚古溪，夫唱妇随，彼此相敬如宾。

“举案齐眉”这个成语也成了夫妻恩爱、相敬相敬的代名词，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风华的一抹浪漫亮色。

阎贺/图 鸿宣/文

诗词鉴赏

浪淘沙

●[唐]刘禹锡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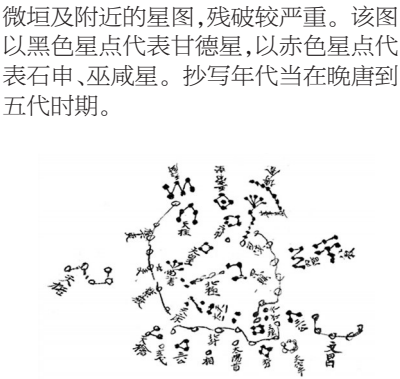
赏析

刘禹锡一生仕途坎坷，“王叔文变法”失败后初次被贬，其后二十三年间多在南方流连任职，用他诗句中的话来说就是“二十三年弃置身”。在这连续的贬谪中，刘禹锡并未沉沦、绝望，而是从苦闷的生活中寻找着生活的诗情。南方民歌风行，刘禹锡自愿做一个采风者，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并模仿其风格进行创作，大都朴素自然、清新可人，著名的有《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堤上行》等。

诗歌创作的背景已不可确考，但从文本看，似乎是诗人途经黄河，远望“黄河之水天上来”而生发的诗意。诗人汲取民歌的营养，诗歌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和刚健、明朗的风格。诗歌前两句写景，黄河九曲回环，携着泥沙万里奔涌，大风掀簸，波浪滔天，浩浩汤汤，苍苍茫茫，若从天涯奔来眼前。当时并没有空中俯瞰的条件，万里黄河万里沙的情景自然并非亲眼所见，是作者驰骋想象，虚实相生，才有这股气势雄浑的景象。

后两句则由实到虚，开始做浪漫的想象。传说黄河与天是相通的，《博物志》记载，汉武帝曾指令张骞穷溯河源。张骞乘槎而去，一个月后来到处地方，见城郭如官府，室内有一女子织布，一男子牵牛饮于河。原来是牵牛织女家。诗人化用这个典故，想象自己迎风破浪，溯流而上，直到天上的银河，去牵牛织女家访问一番。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虽遇挫折，却愈挫愈勇、不甘沉沦的坚强意志。

(雨果)



敦煌星图(局部)

从古今一脉看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刘钊

“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为什么今天还要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因为许多思想是古今一脉的。这一点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民本思想，比如“怀天心”“抱天心”“顺天心”“承天心”“度天心”等。什么是“天心”？天心就是民心，天之所想所欲即民之所想所欲。“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郭店楚简·缁衣》引子思的话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形象地阐述了君民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习近平同志在一些重要讲话中多次引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研究传统民本思想，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我们党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官吏的重要要求包括“廉洁正直”，相关记载在出土文献中比比皆是。《睡虎地秦简·语书》记载，“良吏”的表现是“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又廉洁敦敬而好佐上”；“恶吏”的表现则是“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洁，无以佐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写道，“凡为吏之道，必清廉洁正”，认为吏有“五善”“五失”，“五善”之二为“清廉毋谤”，“五失”之三为“居官善取”。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古代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可以看出，古今社会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具有一贯性和延续性，古代的优秀传统和合理规范可以为今天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借鉴和参照。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理念。在古代，山林水泽皆有专人管理，采获捕捞也要求有节制。《荀子·王制》中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鼃鼃鱼鳖鰾孕卵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绝其长也。”再进一步看，古人认为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小宇宙的运行要与大宇宙的运行相合，否则就会“悖乱”，此即“天人合一”。出土文献中也有很多古人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资料，如《睡虎地秦简·田律》律文中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烧草为灰……”这正可与《荀子》的记载相印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理念，尊重自然规律，探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统一的有效路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思想上的古今一脉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同时，这也对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比如，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既要做好扎实的文本复原、字词考释、义理推阐等工作，又要与现实联系起来，提炼其当代价值。从古今一脉的视角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其当代价值，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展现新的面貌、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古代科学发现之七——

敦煌星图

●王广超

敦煌星图有两种，分别为甲本和乙本。

敦煌星图甲本是世界上现存星图中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此星图绘制于唐中宗时期(公元705—710年)，除有名无星者外，图上实有星数1339颗。此图是一长卷敦煌经卷的一部分，现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

此星图上的星点用黑色、橙黄色、圆圈和外圆圈间橙黄点等多种形式标注。黑点用以表示甘德星，其余形式通用石申和巫咸星。甘德星、石申和巫咸星是中国较早的几家星表，与占星体系紧密相关。敦煌星图甲本分赤道和北极两部分，赤道部分采用了类似墨卡

托圆柱投影的画法，是一种横图，将沿赤道的星按照十二次的顺序分段排列为12个月的星图各一幅。每幅图下各有太阳位置及昏旦中星的说明，基本沿用《礼记·月令》的说法。图中十二次的起迄度数和《晋书·天文志》所录陈卓的

大体一致，其中的分野说明文字与李淳风《乙巳占》卷三分野第十五的说明文字基本相同。北极部分的紫微垣是按照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图的方法绘制的。

敦煌星图乙本现藏甘肃省敦煌县文化馆，是在一残缺的长卷中的一幅紫

微垣及附近的星图，残缺较严重。该图以黑色星点代表甘德星，以赤色星点代表石申、巫咸星。抄写年代当在晚唐到五代时期。